

#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史？

约翰·马仁邦

赵越 译

[36]在分析哲学的宽泛传统中，有一个被人潜在分享的假设，那就是我们应当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来检视我们学习过去哲学时应采用的方式及其原因<sup>1</sup>。如下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过去的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对今天的哲学是有用的？答案多种多样。有一些人认为它没什么用，但这种轻蔑的姿态如今已经很罕见了，尽管曾几何时，广为传播的观点在于，只有当过去的哲学文本被视为现代贡献，且有助于当下的讨论时才是有用的。与这种观点相反，头脑开放的分析哲学家们正在增多，他们开始接受另一种观点，即过去的哲学对他们的工作来说，确实在某些特殊方面有其重要性。他们认识到过去的哲学家并非我们的同代人，并且认为过去作品的益处并不在于我们能直接借用其中的论证或立场，而是在于其他地方，比如使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以展现那些引起我们辩论的问题之间的偶然性以及立场之间的范围，并为新思想提供前所未料的方向<sup>2</sup>。

因此，我们的展望显得一片光明。将不同的答案放在一起（它们大多并不彼此排斥），也许我们就有信心找到一个范围宽广、非限定而又有其权威性的共识，来得出处理哲学史的方法论（参见 Van Ackeren 2014）。但这种信心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在应当问出什么问题方面，潜在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想要思考哲学史有何目标和方法，“过去的哲学如何能在今天发挥作用”就不是唯一该问的问题。因为仅做出这样的发问，意味着哲学史的价值是纯粹工具性的[37]：它的价值正在于过去的哲学文本能够为今天的哲学家们所用<sup>3</sup>。

与此相反，我将要指出，哲学史除了工具性的价值以外，也自有其内在的价值。它值得就其自身而被追求，这也就是立志书写一种我所说的“真正的哲学史”<sup>4</sup>。随后，我将解释为

---

<sup>1</sup> 本章所讨论的哲学史，视野限定在分析化主导的哲学系的研究实践上（在英语世界的大学里几乎所有哲学系都是分析化的）。非分析化以及混合化的院系（在欧陆越发普遍）面临的是另一些问题。

<sup>2</sup> 举例而言，Sorell & Rogers (2005)中的大多数文章，本文集中的许多文章，以及 Glock (2008)。这一问题曾在曾由 Van Ackeren (2014)提出，见“Was bedeutet der aktuellen Philosophie ihre Geschichte?”“使熟悉的东西陌生化”这个概念是由 Bernard Williams 引入相关论辩的，见 Robaszkiewicz (2015: 85-9)。并不是每一个置身分析化哲学系里的哲学史家都赞同这一观点，一个重要的反例是 Daniel Garber，见脚注 4 及 42-42 页。

<sup>3</sup> 这里还有另一条隐藏的假设：那就是唯一能从哲学史的工具价值中受益的人就是哲学家。这一点也需要被质疑——但并不是在本章内。

<sup>4</sup> Garber (2005: 130)写道：“人们会研究很多对象的历史，包括政治、军事策略、戏剧、餐桌礼仪、螺塞开瓶器。那么为什么不能有真正的**哲学史**呢？”这一评论出现在一段对哲学史内在价值的深刻而又优雅的阐述中，尽管 Garber 没有像我一样强调“真正的”，并且用“真正的哲学史”来描述那种最大程度彰显其内在

什么达成哲学史内在目标的最佳方法，并不和前文中的那些强调哲学史工具效用的建议相协调。我会指出，虽然大多数哲学史学者在理论上反对我的上述判断，但在实践上却紧随着它，并使用了真正的哲学史所需求的那种方法论。但是，一旦哲学史被认为值得就其自身而被追求，那么我们就能够清楚发现，仅仅使用正确的方法是不够的。一种真正的哲学史同样还需要充分的广度与详尽性。而这样一来，分析化的哲学史就会暴露其显著的不足。

### 3.1. 哲学史的内在价值

要作为一种追求活动（pursuit）的内在价值而辩护是很难的。因为这一活动自身是具有价值的，而这种价值不能被其带来的便利或影响这样的外物所阐明。有些哲学家对于内在价值的承载者有着非常严格的态度。他们否认任何追求活动拥有这样的价值：用他们的话说，各种追求仅在工具性的意义上是可贵的，比如由于它所产出的快乐、幸福或道德上的善好（以及其他类型的价值）。只有这些价值观念才是内在值得的。自然，这种严格的眼光不会认为，哲学史应当就其自身而为人所研究。但如果没有更进一步的论证，他们其实并没有理由认为，在产生他们认为可被内在可贵的显著价值这方面，哲学史逊色于哲学；正因为如此，哲学史的价值虽然是工具性的（就像哲学本身，以及其他每一门学科的价值），却也绝不是哲学家的使用中才被需要的。而对眼光不那么严格的人来说，知识的不同分支，就像不同的美术那样，显然是具有内在价值，并可成为追求活动的对象的；既然历史值得就其自身被研究，那么哲学史又为什么不行呢？哲学史内在的价值就像一种特殊的历史，其内在的可贵也与其他历史作品同属一类。

[38]然而并不奇怪的是，相较于其工具价值，哲学史的内在价值总是被人们忽略。哲学史学者在分析的哲学系里是少数派；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因宽容的好奇心而存在于院系内，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被无视甚至鄙夷；他们的核心兴趣，仅因其历史性便处于同事们所见的主流领域之外。因此自然而然，他们就希望从边缘位置挽救他们的学科，而方法就是向占据主导、声名卓著的多数派，展示哲学史对他们做出的潜在贡献。至于那些并非历史学家的哲学家们，也乐于只在这一点上接受这种奇怪的历史性活动，它在哲学系内找到的存在方式，就是辅助哲学家们的工作。

不过，有些哲学家以及哲学的外行人，也有另一个理由宣称哲学史的价值，就在于它有

---

价值的哲学史写作。事实上，Garber此文的主要目标（以及在Garber 1989中，另参见Garber 2001: 244-5）在于展示，哲学史除了拥有内在价值，它也同样对哲学家们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益于哲学，而且即便这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首要的价值。因为他们相信，哲学自身的主要价值也是工具性的。不过，他们在看待内在价值时并不那么严格，并且他们也通常承认一切学院内的学科都有某种程度的内在价值。但他们认为，哲学远比其内在值得的东西还要重要和有价值。按他们的说法，哲学这一领域，是我们学习如何生活得好，如何将我们组织成政治共同体，以及如何得到知识并避免假信念的领域。因此哲学史或许就其自身有某些价值，但更多地是因为对哲学决定人生以及提高人生的功能有所贡献，它才具有更高的价值。

我并不接受这种对哲学工具价值的高度评价，因为哲学从来都不能抵达一个确定的、为人赞同的结论，以使人们能在此基础上可靠地建立生活方式或是政治社会的结构；而且我们也没有很强的理由，相信哲学在工具性的方面已经带来、或正在产生更多益处，而非伤害——事实上，有明显证据指向反面的结论。虽然如此，即便我们同意哲学确实具有这种很高的工具价值，我们也很难看到哲学史在制造这种价值方面有什么贡献。当哲学以这种方式被视为人生指引，它其实就被当成了某种超级自然科学：作为学科，它一直都在进步，并且虽然其中有争论，但在任何时候，关于大多数问题的正确答案，它都拿得出一份专业的统一意见。而在这样的学科里直接研究过去的文本，对当下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微乎其微的。既往伟大科学家们的发现已经被吸收进了学科的主干中，被修正、用另一些术语表达、并通常被超越了。因此，如果对哲学持有这种态度的人还希望能思考哲学史，那么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将精力集中在哲学史的内在价值上，尽管这种内在价值与他们眼中哲学史对哲学的工具价值相比，是十分渺小的，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哲学史的内在价值也不应该比大多数学院学科来的要低。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化学家与生理学家，他们有很强的理由认为自己的学科有巨大的工具价值：他们很少回到自身科学的历史中寻求直接帮助，但总是承认其学科作为独立特定学科的内在价值。

### [39]3.2. 真正的哲学史的方法

我们应该怎么研究哲学史，才能将目标导向具有最高内在价值的工作——也即一种真正的哲学史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虽然做到它需要苛刻的条件。在研究过去的文本时，我们需要同时在哲学的和历史的两个层面去理解它。说哲学地理解文本，我是指，在阐述时要精确地挖掘出它所论证、宣称或提出的内容。而要这么做，题中应有之义就不仅包括仔细权衡词语的意义，也不止要对文本的文学类型及其对表达内容的影响有所警惕，还更要考虑论证前提的可信度，以及文本的智识与社会语境中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内容；此外，研究者还需要仔细

考察文本中明确提出或暗含的推理,并在这样做的时候促使读者去思考反驳论证与对立的考量,以及作者又如何能够满足这些反驳。

这种对文本的哲学性理解,同时也是历史性理解的要求之一:哲学文本必须要哲学地加以理解,否则它不仅在哲学上不充分,而且也是很糟糕的历史。好的历史旨在理解过去。但除非哲学地阅读哲学文本,我们就不能理解它。军事史家们不需要自己当将军,但要深谙他们研究的特定年代里战争的机制与技巧,并且带着战略的技艺和目标。同样地,尽管围绕哲学写作的历史学家们,自己不必是创造哲学论证的哲学家,但他们对哲学论证的世界要有彻底的熟知,否则他们就理解不了所读的东西,只会原样重复原作者使用的词句。

然而,对文本的哲学性把握还只是历史性理解的需要之一。一方面,为了全面理解文本,除了哲学技巧,我们也要将精力用于历史与语文学的技巧。了解作品的原始语言版本,并自觉意识到文本与作者可能有过的言论间的裂隙,都是理解文本过程中的基本部分,并且完全不亚于呈现文本哲学问题的能力。事实上,这两个进程是并驾协作的。当我们看着校勘栏,想要寻找文本异读时,我们会问“这些文字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许多因素综合起来,比如自己的语法、词汇知识,作者的总体观点与目标,作品的智识语境,文体的要求,以及论证的融贯度与关联度。哲学的、语文学的、文学的以及历史的考量,相互交缠、确证、修正并启发着对方。

另一方面,哲学史上的大多数优秀研究成果,都不仅局限于文本的哲学性理解——也即提供文本中立场与论证的说明,因为它虽然事关根本,但还只是文本理解进程的第一步。为了能使这种理解对历史性讨论作出全面贡献,学者还需要更进一步,为自己添加一套特殊的历史性[40]能力:这种能力旨在探索人类事务中的原因与影响,在更广阔的图景中看待细节之处(在这里就是细化的论证),并发现一般模式以及间断点<sup>5</sup>。

这些要求看起来或许显而易见,但它们都远远超越了主流分析哲学史家在其明确讨论中面对的内容。在为一部重要的哲学史方法论论文集所写的导言中,汤姆·索雷尔(Tom Sorell)自满地评论道,在分析哲学中接受训练并工作的研究者不需要“广泛的”(extensive)历史知识,也不必拥有“基础”(elementary)知识以外,关于“过往文学、宗教、艺术和科学”的更进一步了解,他们也不必“知道文本所用的所有原始语言或……了解怎么阅读并辨别一个文本的不同手稿”(Sorell & Rogers 2005:4)。但为什么不需要呢?当然,任何一个寻求哲学广泛知识的人,都需要阅读某些翻译过的文字,并依赖于这些翻译的帮助;也只有少数专家会拥有所有必要的技巧和耐心,去编订文本的考证版。但在一个哲学史家的特定领域里,例如古

---

<sup>5</sup> 关于哲学史家所需的能力,相似的严格要求可参见 Catana (2013)。

希腊、17世纪英格兰，或是19世纪德国，掌握相关的外语都是合情合理的（至少应该分别掌握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德语），而诸如文本考订以及书目学技术这类学术技能也是需要的；最后，对历史、智识和文化背景的细节性把握也不可或缺。没有这些技能，研究者就不可能书写一种真正的哲学史。

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应当拒绝一种研究过去哲学时出现的意见，虽然它得到了人们极为普遍地接受：这就是在研究者中做出劳动分工，将研究过去哲学的哲学家，与研究同一材料的智识史家（intellectual historian）或思想史家（historian of ideas）区分开<sup>6</sup>。哲学家们（包括那些以职业化标准投身于哲学史的哲学家）应当以这种哲学性的方式看待文本；而历史学家则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研究。这种划分是特别诱人的，因为它很便利地对应了大学中研究机构的划分，也就是哲学系与历史系的区分。但是，如果这种划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也被人广为接受的话，那么哲学奠基的哲学史家与历史奠基的思想史家之间劳动分工造成的后果，就是强化了人们无法恰当研究哲学史这一结论，因为对每一个学者而言，要恰当地研究哲学史，需要的恰恰就是将这两个分工群体的训练与能力结合起来。哲学文本需要通过哲学的方式研究，以达成恰当的理解。然而语文学和历史的专业技能也是必需的，它们既保证了哲学性的研究得以可能，又能从中提取出富有价值的哲学史。

不过一般而言，论证这种劳动分工是有害的，并不意味着说哲学史就根本不应该存在分工。由于思想史[41]在文化、制度、社会以及政治史上的投影，相比于关于那些更宽泛、甚或更粗糙的术语的知识（思想正是从这些术语中流布出来的），对细节论证的精确哲学把握就显得有些无用了。而那些缺少历史与语言专业技能的分析哲学家，在涉足过去的文本时往往就显得很有价值，这要么因为他们的涉足对当代哲学有着工具性价值，要么由于他们对真正的哲学史家给出的建议，后者往往会由此发现他们的僵化思想，能因某一新鲜的视角而出现富有成效的扰动。但是，这种贡献所处的位置是真正的哲学史的边缘——它们是作为反例而体现出重要性的，而不是作为规则。

从上述论证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在分析的哲学系中，哲学史家们是在竭尽全力讨好他们的同事，为他们提供具有工具价值的成果，并且不愿拥抱他们工作中更为历史性的维度，往往因此无法产出就其自身具有价值的成果。但这种结论显然是错的。翻开这一领域内某本声名卓著，且具有分析倾向的期刊的最近一期（比如《哲学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或《不列颠哲学史期刊》[*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其中刊载的文章都会展现对论证的哲学性把握，而这种把握则是通过以下两方面得出的，那就是

---

<sup>6</sup> 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是 Bernard Williams (1978: 9) 做出的。关于这一立场的进一步延伸，见 Normore (1990)。

对文本原始语言的细致研究，以及至少某种程度上来自语境性知识的启迪。的确，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缺陷，都会成为引用者们拒绝认同作者观点的理由。没错，很多这类文章也很狭窄，它们只从上下文中摘取了某个特定的论证或阐述问题，并以一种清晰但却呆板的方式一步步得出结论，有时还表现出分析哲学逻辑细分（logic-chopping）的作风来。而且，在这些顶级期刊之外，一些文章还会展现出缺乏语文学视角的迹象；至于学术上的校勘，即便在杰出学者那里十分单薄，也常显得乏味不堪。然而，极少有这类文章会极其直接地致力于当代哲学问题；它们在思想上的分野可能是分析的，但它们的焦点总是过去的文本，尤其是就文本自身考虑其中的论证。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抱怨，在聚焦于过去世纪的思想，并唤起其中分析的生命力时，这种工作对当代哲学论证与思想的工具性用途其实并不多。

身处分析哲学系的哲学史家所写的专著也是这样。现在已经很少有哲学史书籍像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笛卡尔：纯粹探究的计划》（*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Enquiry*）那样，在写作上切实遵循“理性重构的指引……而这一重构的理性本质上公开属于当代风格”（Williams 1978: 10）——即便“理性重构”（区别于“宽容阐释”[charitable interpretation]，或由此得到定义）经常在理论讨论中被置于方法论的理想中。让我们看看两位 17 世纪哲学研究的顶级学者，丹尼尔·加博（Daniel Garber）和汤姆·索雷尔。加博是少数那种在分析化的哲学系建立事业，但仍在其理论探讨中（1989；2001；2005）明确倡导了[42]一种“古物研究”（antiquarian）进路的哲学史家<sup>7</sup>。与之相反，索雷尔则如上文所引，接受了劳动分工，并认可分析的哲学史家应当摆脱古物研究的束缚，为当代哲学家而服务。因而，我们应当期待他们的著作在路线上相隔甚远。然而事实上，二者之间仅有细微的差异。加博关于笛卡尔（1992）与莱布尼茨（2009）的主要研究，确实拥有更多的语境细节（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比一般分析哲学史家著作更多的人物生平信息——这两部研究的语境指涉更广，学术背景也更深。与此相反，索雷尔 1986 年关于霍布斯的研究，则将作品裁剪得只剩下了纯粹哲学的骨架，反映了它所属的丛书“哲学家们的论证”（*Arguments of Philosophers*）的一贯风格，尽管这套书如今已然半告消亡（见 Garber 2001: 232-4），但在他为《笛卡尔》（Sorell 1987）一书所写的简短导言中，却充满了智识与科学史的细节。索雷尔还编辑了相当数量的文集，深入探讨了更多的历史材料，并乐于在原则上提供给受分析训练的研究者，因为这些材料是容易为他们所忽视的；而为了做到这点，他自己的贡献与加博往往有着相同的脉络。因此，无论是索雷尔还是加博，看起来主要都朝向了一个目标：用当下人易于掌握的语汇，提供一个清晰精到的阐释，来说明过去哲学家的立场与论证；尽管加博往往选择更有技术性、更令

---

<sup>7</sup> 见脚注 4。

人厌烦的材料，它们也需要更多介绍与解释。在他最近关于笛卡尔的书（2005）中，索雷尔的确将自己的目标精准定位为“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来平衡笛卡尔所说的内容与他这样说的理由，及其在我们现有的哲学中值得讨论的内容”，但他也同样意识到了“本书并不属于哲学史的类型”（Sorell 2005: xx）。

简而言之，对分析化的哲学系里的哲学史家来说，他们的诸多理论主张以及通常实践之间存在着裂隙，但即便如此，这样的哲学史家们仍然在研究过去的文本，并且是以就其自身价值的方式在研究。这样看起来，真正的哲学史似乎并不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众多分析化的哲学系就在产出这样的哲学史。只有少数哲学史家将他们的工作提升到理论层面，这一事实看起来甚至成为了有用的策略，以帮助他们在自身院系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将方向指向当代问题，并同时真正将精力集中在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上，为其自身之故而研究。但这一乐观的图景不过是幻象。仅仅将关注个别文本和哲学家的真正历史作品放在一起，并不能构成一种真正的哲学史。仅有正确的方法论是不够的。

### 3.3. 超越方法：真实哲学史的眼界

在评判个别的哲学史作品时，我们看的是它们所用的方法是否可以接受，以及这种方法使用的优劣，但是一个特定领域中历史学术研究的状态[43]，则不能仅依据它们在其思考领域做出的贡献卓著与否，还要跟随广度与详尽的标准。设想我们现在评估一项法国政治史研究的优劣。尽管政治史是一个特殊领域，我们还是有理由抱怨它的理解可能过于狭隘（比如，研究仅限定在高层政治，或忽视了政治与经济环境之间的关联）。更进一步地，我们还期待一种特定的详尽性，即研究范围覆盖从记录开端延伸至今的历史。对单独一所大学来说，在其提供的研究中存在裂隙无可厚非，如果有某个时代从未得到研究或研究贫乏，抑或大量成果仅集中在某几个世纪内，那么这就会构成一项短处。详尽性同样也有地理的维度，尽管边界的变动会增加研究者需要提供的内容，来说明在过去什么特定地域能用现代的国名来称呼，比如“法国”。不仅如此，详尽性还要求在处理一个时期的材料时毫无偏私。当然，个别的历史学家需要聚焦于特定地域和主题，并时常在一开始受到当代关切的推动；历史学家从不是完全不偏不倚或毫无自身视角的。但如果大部分研究者在实践中只从一个角度去书写，那么这一领域的历史就会深受其害。如果对过去的呈现，遭受了当下政治中那些确定因素的挑选甚至重塑，这一历史尤其会受到损害：即便是那些欢庆民主进步的人，对辉格式的历史写作评价也不甚高，而在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命令下书写的“历史”则广为人所不齿。

当在分析化的哲学系研究哲学史时，广度与详尽性的疏失尤为令人瞩目。在讨论广度时，我们必须承认，对“哲学”的理解应该有多宽，研究者其实并无共识。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人们用哲学这个词，或其同源词描述的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问题域，而且很多人所共知的伟大哲学家，比如亚里士多德、阿维森那、阿奎那、莱布尼茨、笛卡尔和休谟等，都在如今不被当做哲学的领域有过大量著述，这些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医学、神学、数学以及历史。要从这些材料中挑选出能被叫做哲学的东西，一种方法就是从我们今天的哲学问题开始，在过去的讨论中寻找相似的关切（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关切）。这或许也是分析哲学史家拣选材料时最为广泛采用的方法，尽管未受公开承认。当然，在处理过去的材料时，它有助于得出一个收窄的选集，但它理应在第二阶段得到完善；在第二阶段，哲学史家会跟随论证与信息中的联系，替换他们从原始语境中挑选出的讨论，并因此给出一个更为宽广的论述，它几乎一定会横跨许多现在不被当做哲学的领域。这两个阶段合在一起，就能提供一条路径（我称之为“历史性分析”[historical analysis]，见 Marenbon 2000，特别是 15-19；2015：305-6），并据此挑其广度合理的一批材料，而不去随之加宽研究的眼界，以致使哲学史转变为一般的智识生活史。[44]即便如此，这条路径可能也还需要其他的東西来完善它，只有这样才能在整个领域中建立合理的广度<sup>8</sup>。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析的哲学史家仅仅跟随了历史性分析的第一个步骤，而且甚至在这一步，当需要让眼光超越知名人物组成的狭窄正统叙事时，他们也显得过于保守。比如在 17 世纪，几乎一切工作都指向了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和贝克莱的五重唱，这就使得如下作者观者寥寥，如霍布斯（虽说可能会包含在政治哲学的课程里）、伽桑迪（Gassendi），马勒布朗士（Malebranche）、贝尔（Bayle）、以及阿诺尔德（Arnauld），尽管他们在智识层面与知名的五重唱相去无几；而那些视域不同的思想家，诸如苏亚雷斯（Suárez）、卡拉穆埃尔·伊·洛布科维茨（Caramuel y Lobkowitz）、克雷孟尼尼（Cremonini）、康帕内拉（Caanella）、拉蒙特·勒瓦耶（La Mont Le Vayer）、彻伯里男爵爱德华·赫伯特（Herbert of Cherbury）、以及卡德沃思（Cudworth）等人，则完全被排挤在外<sup>9</sup>。更有甚者，由于哲学写作的定义非常狭窄，而当代分析哲学对论证的强调又被明确用于界定过去遗留的材料，这就使得一些作者，如库萨的尼古拉（Nicholas of Cusa）、蒙田（Montaigne）、以及帕斯卡

<sup>8</sup> 在 Marenbon (2015: 305-6)，我给出了另一种方法（“历史性综合”[historical synthesis]），来达到同样的结论。广泛的学说史论述，如在新版《宇伯威格哲学史》

[http://www.schwabe.ch/upload/tx\\_ttproducts/datasheet/Editionsplan\\_Ueberweg\\_02.pdf](http://www.schwabe.ch/upload/tx_ttproducts/datasheet/Editionsplan_Ueberweg_02.pdf)（作为中世纪方面的一个范例：Rudolph 2012），同样服务于这一目的（我非常感谢 Dominik Perler 在论文原稿的评议中指出的这一点）。

<sup>9</sup> 在对英国最好的二十个哲学课程中的哲学史课程的说明里，这十二个名字里只有马勒布朗士被提到了一次，见附录（b）。



(Pascal) 也被拒之门外<sup>10</sup>。在这种缺少广度的情况下，我们能看到劳动分工所能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之一，那就是哲学史因收窄其焦点而心满意足，并将那些作者拱手让于思想史家们。因为尽管哲学史家承认这些作者饶有趣味，却并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

作为一个领域，分析化的哲学史在第二个标准，也即详尽化方面的作为就更不合格了。问题并不在于涵盖范围内存在绝对的缺略，而是相对的疏失。也许哲学史上已经没有哪个时代，还没被某时某地的分析哲学史家研究过了，尽管研究不一定是在哲学系内展开的。然而，为数众多的研究还是只集中在两个短暂的时段——公元前 4-5 世纪，以及从 1600 年起的时期，这就如汪洋之中的两座孤岛一般。通常而言，哲学史的图景的呈现方式，与哈哈镜中的映像别无二致，每个人在哈哈镜里都会照出硕大的双脚和巨型脑袋，而身体则缩得如同苍蝇的躯体一般纤细。

在分析哲学世界内部的研究者能认识到这样的描述——尽管只有少数人希望用这种戏剧化的语言形容自己。然而，实证调查只会进一步确证这一看似主观的描述（见附录中的细节）。在二十世纪分析化哲学系内所做的哲学史研究中，88%都集中在了这两座孤岛上。事实上，即便在近现代时期里，也只有 17 和 18 世纪得到了压倒性的关注（这一时期占据了全部研究的 40%，而 19 与 20 世纪仅占 16%）。本科生的课程也显示了[45]同样的不平衡现象，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古代与早期近代哲学，尽管这已经是不那么夸大的结果。

然而，现状的拥护者可能会指出——与政治史完全相反——我们没有理由期待哲学史应该平均地、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展开：以其他时期为代价而集中于个别时代，单纯只是对事实的反映。原则上说，这条反驳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在整个宽阔漫长的哲学传统田野中，的确存在着撂荒的时期，在此期间哲学史家们的研究可能颗粒无收。但事实上，从前苏格拉底直至今日，西方哲学传统恰恰以其连续性而著称。而且，只有一些哲学史被反复研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正如一位颇为进取的哲学史家现在正在做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书写一部“没有空隙的哲学史”（Adamson 2014; 2015）。大量哲学工作达不到高水平的世纪是不存在的。看一看分析化的哲学史课程最常跳过的两个世纪：16 世纪和 10 世纪。16 世纪是彭波那齐（Pomponazzi）、扎巴雷拉（Zabarella）、维托里亚（Victoria）、丰塞卡（Fonseca）、德萨托（de Sato）、苏亚雷斯、蒙田和桑切斯（Sanchez）的时代，也是伊朗萨法维王朝（Safavid Iran）治下，哲学开始兴盛的时代。而 10 世纪的拉丁世界哲学尽管并不突出，但在阿拉伯世界，这却是阿尔法拉比度过大半生岁月，而阿维森那开始其学术生涯的世纪。

最后一点也立即将问题引向了地域的详尽性这方面。我在本文中讨论的只是“西方”哲学

---

<sup>10</sup> 这三位都没有出现在脚注 9 中提到的哲学史课程说明中。

的历史（其他哲学传统的确应当得到研究，它们遭受的忽视也是值得哀叹的——但这个问题并不同于我们现在谈的话题）。然而当来自巴格达、波斯和中亚的思想家被纳入西方哲学，我们难道就不该跨越地域详尽性的边界吗？相反，如果西方哲学传统像几乎所有哲学史家所赞同的那样，需要追溯到前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那么它明显就拥有四个分支：首先是希腊哲学，它在拜占庭一直延续到 15 世纪中期；然后是拉丁哲学，它最明显地始于 17 世纪以后，也即拉丁系与日耳曼系的民族语言用于哲学书写的时代，但也包括之前的时期；第三个是阿拉伯哲学，第四个则是犹太哲学，它先是用阿拉伯语书写，直至 1200 年前后，然后主要使用希伯来文，并最后使用欧洲的民族文字，直到它在 19 世纪失去自身独特性<sup>11</sup>。相比起时间覆盖的疏忽，分析哲学史领域在地域详尽性方面的失败，更成为了一种独家专利。当然，这里的失败也是相对而言的，而非绝对的缺失。在分析化的哲学系内，偶尔也有几个专家研究阿拉伯哲学或犹太哲学的某些部分，但更多这一领域的学者则隶属于伊斯兰或犹太研究院系，或神学系，古典学系，而又与分析化的哲学史家共享某些研究方法<sup>12</sup>。

[46]为什么详尽性的缺失是事关重大？尽管哲学史中只有少数时期能时常得到研究，但这难道不是因为它们经受过富于洞察力和真诚的检验吗？还是说，是这些研究书籍和文章反过来使它们具有价值的？无需质疑，这些时期自有其价值，但在与真实的哲学史语境中的内容相比较后，它们的价值会遭到削弱和降格。之所以被削弱，是因为即便专门的研究考察也需要放在更广的时代框架中，然而，由于在少数流行的专门领域之外，很少存在同等水平的研究，这就使得丰富语境的工作变得相当贫乏无力。而其价值之所以被降格，是因为当我们单独看待某项考察时，它在历史研究中固然有着耀眼的一面，但这份光明是有代价的；由于在过去两千五百年里高度发达的哲学工作中投下了阴影，它的代价就是把整个历史映衬得一片黑暗，并成为了这其中的一部分。更糟糕的是，这些阴影并不是由于缺少光而随机投下的，而是依据一种政策，就像某类历史或虚假的“历史”那样，依据政治议程而有选择地书写。在分析化的哲学系里，哲学史作为整体是由成功者们书写的——这些成功者不仅意在摧毁他们的敌人，甚至还毁坏关于他们自身功业的记忆。有两个成功者在形成这套哲学史时居功甚伟。一个是战胜了经院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笛卡尔主义哲学，而另一个是摩尔和罗素，他们在 20 世纪之初击败了广为接受并统治英国的黑格尔主义。在这种高度选择性的哲学史视角的形成过程中，二者都发挥了特别作用，因为它们所反对的不是某个对立且有讹误的哲学学派，而

---

<sup>11</sup> 尽管这一点看起来很明显，但它却总是遭到忽视，直到 Alain de Libera 的教科书于 1993 年出版；我在 Marenbon (2016) 中也尝试提供了案例，来从这个角度看待西方哲学传统。

<sup>12</sup> 读者可在附录中寻找简单的数据。数据显示，在最好的哲学系中，拜占庭传统完全没有得到研究，阿拉伯语犹太传统研究也十分稀少（而且没有对 1200 年以后的讨论）。

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哲学发展路径。这一远一近两个胜者已经摆好了正确的路线，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分析哲学家作为这一路线的继承者，为什么对他们推进的哲学史中的狭隘与局限性视而不见。

### 3.4. 为什么哲学家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史

在 3.1-3.3 三节中，我们已经完成了本章开头承诺的大部分讨论计划。我们确立了哲学史内在拥有价值，而且为了完全达成这一价值并写出真正的哲学史，不仅需要特定的方法，还需要富于宽广视野与详尽性的进路。来自分析化的哲学系、关于哲学史方法的理论作品，很少承认这些方法，有时还明确反对它们，但在大多数分析的哲学史家依然在实践中使用这些方法。然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分析的哲学史在宽广视野和详尽性上有着重大的缺陷，因而，在一种很重要的意义上，很多完成了分析化哲学课程的学生，会比他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更加忽视自身学科的真正历史。

这一论述可能会惹恼分析哲学家们，还可能促使那些有权力设置大学课程、并在院系内打造<sup>[47]</sup>专业团体的人，重新思考他们在课程上做的决定，以及人员任命。然而，他们可能会阅读我的论述并欣然接受，但却否认本文可以给他们改变的机会。他们会回应说，“你所说的一切，都建立在哲学史就其自身拥有价值这一点上。没错，我们不否认它有内在的价值，但**我们**没有理由去在乎这份价值。我们所追求的是你所认为的另一门学科，也就是哲学。从我们的观点看来，只有在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有用的时候，哲学的历史才是有价值的。你完全可以为了其自身的价值追求你自己的学科，但请不要在我们的系里做这项研究。”

不过，我们是回应这种反驳的。其中之一——我们可以论证它也是原则性的回应——哲学史对哲学具有的工具价值，其实依赖于它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并拥有很高的内在价值：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哲学史<sup>13</sup>。

哲学家们理应探究的一系列中心问题，可以被如下这个简单问题所表述：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也牵涉到了其他的问题。比如什么样的问题是哲学问题，我们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探究，如果确有目的，那么又是什么目的？这种探究又如何与其他的人类活动相连，比如智识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活动？尽管这类问题组成了一个可供研究的独立领域，并且，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包含我们接近每个哲学分支的应有方

---

<sup>13</sup> 在 3.4 中讨论的内容，究竟是不是哲学史对哲学家们起价值的基本方式，取决于我们能将多少价值，归给其他那些被认为有助于哲学家的方式：关于其他价值抱持怀疑态度的观点，见 Marenbon (2011)。

法，一个严肃的哲学家就有很强的理由不去忽视这些问题。然而，这些答案并不能通过概念分析的方法得到解答。因为哲学不是一个自然类，而是一种人类实践活动，甚至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去理解它是什么——而不仅是它如今恰好所是的样子——则依赖我们对如下问题的理解，即它在历史上是如何实践的，它所共有的东西是什么，又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分化的。

同样有两种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一种是学习我们自己的宽广传统中的哲学史，另一种是学习其他不同传统的哲学（比如印度哲学或中国哲学）。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史？很明显，如果可能的话，它应当是一种真实展示哲学如何实践与发展的历史。然而与此相反，哲学史总是汲汲于讨好分析化哲学内的大多数人；哲学史应当增删什么内容，取决于这些成员的兴趣，以及他们碰巧有所了解和一无所知的内容；分析的哲学史家这样做只会走上一条弯路，远离对过去实践的理解，并包庇自己的无知，强化自己的偏见。因此，如果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为分析哲学发挥功能并服务于它，那么最终，它就无法指向对它自身来说最为重要的东西。想要达成它的工具性功能，我们只有不将它作为工具，而是就其自身来追求，而这就是提供一种真正的哲学史。

## 附录

[48] 这份附录提供的实证研究，印证了我的断言，即分析化哲学系内的哲学是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特别是古代和早期近代。这里提供了两份研究调查结果：首先 a)关于二十个顶级分析化院系的哲学史家研究兴趣的调查；其次是 b)关于二十个最好的英国哲学系的哲学课程中的历史性内容。各种统计数据基于在线资料，在本章完成待出版的 2016 年春季均可获得。

### (a) 哲学史中的研究兴趣

调查范围：下面这些分析哲学占主导的哲学系，大概构成了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世界大学排名的前二十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NU)、伯克利、剑桥、芝加哥、哥伦比亚、爱丁堡、哈佛、伦敦政经 (LSE)、密歇根、麻省理工 (MIT)、牛津<sup>14</sup>、纽约、圣母、牛津、匹兹堡、普林斯顿、罗格斯、圣安德鲁、多伦多、耶鲁。所受雇于哲学系，并曾出版过哲学史研究成果的教师/研究者均包括其中，但不含访问学者或荣休教授。

方法：此处的分数旨在展示将学术时间全面投入哲学史某一领域的哲学家人数。因此，如有学者将学术时间平分给两个领域，则各记 0.5 分。

结果 (降序排列)：1600-1800 年间的欧洲哲学：50.7；古希腊哲学：38.75；19 世纪欧洲哲学：9.2；1200-1400 年间的拉丁哲学：8.25；二十世纪大陆哲学：8；二十世纪分析哲学：4.1；希腊化与罗马哲学：1.5；晚期古代哲学：1.5；600-1200 年间的拉丁哲学：1.25；1200 年前的犹太哲学：1；1200 年前的阿拉伯哲学：1；1400-1600 年间的拉丁哲学：0.5。以下领域没有专门学者：拜占庭哲学；1200 年后的阿拉伯哲学；1200-1600 年间的犹太哲学。

附注：1600-1800 年欧洲哲学中的三分之一分数是由研究康德的专门学者贡献的。600 到 1200 年，以及 1200 到 1400 年间的拉丁哲学，还有 1200 年前的阿拉伯哲学，基本上只依赖两所学校：多伦多与圣母。

### (b) 哲学课程中的历史性内容

研究范围：根据 The Complete University Guide 列出的英国最佳的二十个哲学院系，因材料不足略过了布里斯托，并加上了曼彻斯特：伯明翰、剑桥、杜汉、爱丁堡、埃克塞特，伦敦国王学院 (KCL)，兰开斯特、利兹、LSE、曼彻斯特、纽卡斯尔、诺丁汉、牛津、皇家霍洛威、圣安德鲁、苏克赛斯、伦敦大学学院 (UCL)、华威、约克。仅包含本科生课程。

<sup>14</sup> 原文如此。以字母顺序排列，此处的牛津当为另一院校。

[49]方法：（1）每一份课程试卷或一单元与哲学史某一领域的整体或部分相关，则记一点数。内容普遍包含整个哲学史的试卷不计入此列；（2）在前一项中每提及一位哲学家，则记一点数。

结果：（1）（降序排列）：1600-1800年间的欧洲哲学：27；古希腊哲学：17；十九世纪欧美哲学：14；二十世纪大陆哲学：14；二十世纪分析哲学：10；希腊化与罗马哲学：6；1200-1400年间的拉丁哲学：6；晚期古代哲学：3；1200年前的阿拉伯哲学：2；600-1200年间的拉丁哲学：2；1200年前的犹太哲学：1；1400-1600年间的拉丁哲学：1。以下领域没有出现在课程中：拜占庭哲学；1200年后的阿拉伯哲学；1200-1600年间的犹太哲学。

（2）（降序排列，忽略提名少于五次的人物）：亚里士多德 20；柏拉图 19；休谟 18；康德 17；洛克 12；贝克莱、笛卡尔、尼采、维特根斯坦 11；黑格尔 10；海德格尔、罗素、斯宾诺莎 7；弗雷格、莱布尼茨 6；奥古斯丁、邓斯·司各脱、萨特 5。

附注：此处选择英国大学，是由于它们拥有比较专门的本科哲学课程。（1）与（2）的目标仅在于提供一个大致印象，关于学生可以获得什么内容，又有什么未受足够重视。

#### 参考文献：

- Adamson, P. (2014), *Classical Philosophy: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out any Gap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damson, P. (2014), *Philosophy in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Worlds: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without any Gap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tana, L. (2013),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What Are They?', in M. Lærke, J. E. H. Smith, & E. Schliesser (eds),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Ai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5-33.
- Garber, D. (1989), 'Does History Have a Future: Some Reflections on Bennett and Doing Philosophy Historically', in P. Hare (ed.), *Doing Philosophy Historically* (Buffalo NY, Pergamon Press), 27-43.
- Garber, D. (1992), *Descartes' Metaphysical Physics* (Chicago IL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rber, D. (2001), 'Au-delà des arguments des philosophes', in Y. -C. Zarka (ed.), *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31-45.
- Garber, D. (2005), 'What's Philosophical about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Sorell & Rogers (2005), 129-46.
- Garber, D. (2009), *Leibniz: Body, Substance, Mona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ock, H. -J, (2008),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 mismatch', *Mind*, 117:885-97.
- Libera, A. de (1993), *La philosophie médiéva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Marenbon, J. (2000), 'What is Medieval Philosophy?', in J. Marenbon, *Aristotlian Logic, Platonism, and the Context of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 in the West* (Aldershot & Burlington VT, Ashgate), no. xvii.
- Marenbon, J. (2011), 'Why Study Medieval Philosophy?', in T. Kobusch, J. Müller, & M. van Ackeren (eds), *Warum noch Philosophie? Historische, systemat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Positionen* (Berlin & Boston MA, de Gruyter), 65-78.
- Marenbon, J. (2015), *Pagans and Philosophers: The Problem of Paganism from Augustine to Leibniz* (Princeton NJ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renbon, J. (2016), *Medieval Philosoph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rmore, C. G. (1990), 'Dox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Supplementary Volume*, 16: 203-26.
- Robaskiewicz, L. (2015), 'Bernard Williams zum methodischen Gebrauch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Philosophie Jahrbuch*, 122: 76-95.
- Rudolph, U. (ed.) (2012), *Philosophie in der islamischen Welt, vol. 1: 8-10. Jahrhundert* (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Basel, Schwabe).
- Sorell, T. (1986), *Hobb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Sorell, T. (1987), *Descartes* (Past Mas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rell, T. (2005), *Descartes Reinven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orell, T. & Rogers, G. A. J. (eds) (2005),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Ackeren, M. (2014), 'Was bedeutet der aktuellen Philosophie ihre Geschichte? Positionen-Probleme-Pragmatismus',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68: 305-27.
- Williams, B. (1978), *Descartes: The Project of Pure Enquiry* (Harmondsworth, Penguin).